



闻一多颂

王 康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K825.6

闻 一 多 颂

王 康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05570



湖北人民出版社

705570

闻 一 多 颂

王 康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25印张 70,000字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3,000

统一书号：11106·122 定价：0.22元

目 录

青少年时代.....	2
留学美国.....	4
向内发展的路.....	9
诗与学术.....	14
“手工业者”.....	17
爱憎分明.....	19
党的指引.....	23
和群众战斗在一起.....	26
和郭沫若同志相呼应.....	35
向鲁迅学习.....	36
美髯“剃得太早了”.....	37
在“一二一运动”中.....	39
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战斗.....	43
拍案而起怒斥凶顽.....	52
崇高的荣誉.....	57
附录 忆昆明.....	61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

周总理说：“鲁迅、闻一多都是最忠实
最努力的牛，我们要学习
他们的榜样。”

闻一多烈士殉难已经三十多年了。

但是，烈士那“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光辉形象，依然深深地留在我们心上。

闻一多是我国知名的诗人，学者，教授，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彰的“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民主战士。他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站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民主运动斗争的前列，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终于为革命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烈士是湖北浠水县人，一八九九年阴历十月二十二日诞生，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下午，为国民党反动派谋杀，壮烈牺牲于昆明街头，终年还不足四十八岁。

在烈士生命经历的这段时间里，正是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加剧侵略我国的时代，是封建的中国日益被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但也正是中国人民日益觉醒逐步开展民主革命的时代。闻一多经历了祖国的苦难与忧患，目击着封建皇朝、新旧军阀和各色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他凭着爱国主义的感情和正义

感，为祖国和人民的苦难奔走呼号，为弄清祖国文化遗产埋头钻研古籍，一生守正不阿，疾恶如仇，终于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找到了他所希望的真理——走上了革命的大道。

青 少 年 时 代

闻一多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在故乡——浠水陈家岭——山村里度过童年。那时科举制度刚刚废弃，新式学堂刚刚创建。他的父亲是清末的秀才，作风谨严，生活简朴，熟悉中国的诗书经史，又早年在外工作，是较早受到新思潮影响的文人，了解时世的趋向。他在乡间办了一所改良家塾——除了学习传统的“诗云”“子曰”，同其他私塾不同的是增添了新式学校里的一些课程。闻一多在严格的家教督促下，还不足五周岁时就入塾就学。他从具有新学知识新的思想的父辈和塾师的教导中，继承了我们民族的一些优良传统——正直、爱国的思想，十岁时进入武昌师范附属小学。不久，“辛亥革命”发生，打倒专制，建立民国，他深深地为祖国是东亚的第一个共和国而自豪，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热爱祖国作为天职，终身坚持不懈。一九一三年，十四岁时，考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这是美帝国主义在清朝末年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庚子赔款”建立的一个学校。他在清华整整度过了九年。

他是当年清华园内一个活跃的人物，是《清华周刊》和《清华学报》的积极撰稿者，以后并担任过两个刊物的总编辑和编

委。他的国学根底较好，常在刊物上写些旧体诗来怀古或述志，有时还喜欢写篇骈体，要以文会友。在课业负担沉重的学校里，他勤奋学习，也善于学习，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优秀学生，同时又是各项课余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每年寒暑假他总是照常读书写作从不间断，特地把他暑假回家读书二月的书房称为“二月庐”。他学习涉猎的范围很广，从古诗词到西洋的诗歌、散文，从历代兴亡的史实到哲学以及严复译的《天演论》都感到“兴味盎然”，主要的是学习清华课业之外的中外名著，特别是我国的古籍。每有所得就成之于文，曾经写过史论，评论人物，还撰作诗话，他最早发表的比较长的作品《二月庐漫记》，就是假期中用中、英文写成的读书笔记。

“五四”运动前后，祖国的忧患和新思潮的影响，使这个年轻人对现实有了越来越多的想望，他开始用新诗的形式来表白自己的思想了，陆续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新诗，还发表了诗论和其他文章，开始步入中国的诗坛，成为“五四”时代新文艺园地里拓荒者之一。

在清华，他对戏剧也很有兴趣，“五四”前就热情参加清华的话剧活动。但他最爱好的还是绘画，主张美育教育，美育救国，美化中华。当结束清华学习选择留美专业时，他决心把艺术作为努力的事业。

闻一多的青年时期，生活内容很丰富，也生活得很正直。在这个由美国所控制的学校里，他满怀爱国热情，时刻都在维护民族的自尊，他曾为反对歧视“国文”课而大声疾呼；为反对宣传强盗抢劫打杀的美国电影在清华演出，公开掀起论战，使借此牟利的有关人员不得不停止营业；还曾在《周刊》上义正词严地对美国的哲学家杜威，在清华系统地宣扬“实用主义”表示不满，讥讽杜威是个不受学生欢迎的“催眠大王”。……

这位沉静好学的青年身材不高，但体格匀称，风度谦和，在厚发浓眉下紧锁着深邃的目光，对不合理的现象，总是勇于公正地提出批评建议。他是当年清华学运中的积极分子。

“五四”运动爆发时，开始清华由于学校性质不同一般，同学都还有所犹豫，闻一多认为学校性质不同，爱国怎能例外？当天深夜他在饭厅门前贴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词，用那多年来深印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爱国诗篇激励着清华的同学。北京进步学生组织也不断前来联系。清华学生毅然排除顾虑和阻扰，很快地投入这个划时代的伟大运动，成为北京学运的一支重要力量。闻一多同其他同学一道以全副精力担任着学生会的宣传工作。当“五四”运动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时，在上海召开全国学联成立大会，闻一多光荣地代表清华出席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听过孙中山先生鼓励学生爱国爱民的讲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留 学 美 国

一九二一年，按照清华规定，闻一多应届毕业，暑假开始就该到美国留学了。但是，就在毕业考试的前几天，北京发生了军阀政府殴击国立八大院校教职员请愿代表团的流血事件。当时，军阀政府对教育事业毫不重视，教育经费长期拖欠，薪水工资也不发放，教职员工生活无着，由李大钊同志、马叙伦先生等为首组织了请愿团，要求军阀政府保障教育经费，补发欠薪。请愿队伍来到新华门前就遭到军阀武装殴打，李大钊同志和马叙伦先生等数十人都被打伤，造成了

“五四”运动后的又一次血案。北京大中小学立即联合一致罢课罢教，相互声援，抗议军阀暴行。清华学生不顾美帝国主义分子和学校当局的阻挠，也坚决地支持了这一正义斗争，宣布罢课，同时光明磊落地作出决定：罢课终止后立即补考。尽管如此，反动的学校当局和美帝所控制的清华学校董事会却以违背校规，诬蔑学生爱国正义行动，断然采取高压手段，妄图以开除迫使学生终止罢课。闻一多和许多正直的爱国的同学一道站在斗争的前列，坚决抵制学校这种反动的镇压行为，北京教育界舆论界也都支持清华学生的斗争。美帝和学校又狼狈为奸改换手法，分化学生的团结，宣称只要立即悔过补考，出国的照样出国，升级的照样升级，否则就以留级处分。由于罢课是支援整个北京教育界斗争的统一行动，清华学生怎么可以临阵撤退单独停止罢课？斗争在继续，只要坚持团结就能胜利。但是，反动派的分化手段发生作用了，有的经不住诱惑的学生，象后来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等人，就不顾集体决议，单独赴考了。他们分裂破坏了团结，毁掉了信义，升级了，出洋了。闻一多在这个考验的关头，维护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他认定自己支援正义斗争的行动是对的，并没有错，有什么“过”可“悔”？宁可留级，宁可晚一年出国，决不背叛集体，出卖人格！就这样，别人八年毕业，他和他的一些战友却被无理地推迟了一年，继续留在清华。

闻一多在走上人生道路的第一步时，坚持真理，经受住了这一次严峻的考验！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闻一多离开了祖国。

还在旅途中，当许多同学都在为出国镀金兴高采烈时，他

却出人意料地把去美国比作“流刑”。到了美国刚住了一个星期，就写信回国告诉朋友说“已经厌恶这里的生活了”。他在诗里倾诉自己的心情，在《孤雁》篇里，描绘了初识的金元帝国：

呵！那里是苍鹰底领土——

那鸷悍的霸王呵！

他的锐利的指爪，

已撕破了自然底面目，

建立起财力底窠巢。

那里只有铜筋铁骨的机械，

喝醉了弱者底鲜血，

吐出些罪恶底黑烟，

涂污我太空，闭熄了日月，

教你飞来不知方向，

息去又没地藏身呵！

闻一多没有倾倒在铜臭的文明面前，而是凭着诗人的纯真刺着金元帝国的痛处了。摩天大楼和五光十色的都市没有使他惊喜，而是怀着“孤寂的流落者”的忧郁，在遥远的异国随时思念着祖国和家乡。

他在给朋友的信上写道：“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但是，不要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他写下了许多爱国思乡动人的诗篇，他说：

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不久以后，他把出国前后这一段时间写的新诗，选编了一部分为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于一九二三年出版。值得提出的是，《红烛》是经由郭沫若同志介绍在上海泰东书

局继名诗《女神》之后出版的。那时，郭老在日本留学，闻先生远在美国，两人从未谋面，但通过亲切的文字之交，相互钦敬。闻一多深深为《女神》所感动，热情洋溢地写了两篇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论；郭沫若十分珍视《红烛》作者的感情，亲自为《红烛》安排出版的书店，对他的《冬夜评论》也备加推重，说“如在沈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说读后“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闻一多先生殉难后，又是郭沫若为《闻一多全集》校读订正并作序。两位卓越的诗人那真挚的情谊何等感人！

闻一多在美国专攻绘画，先后进了芝加哥美术学院、珂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他象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认真学习，刻苦攻读，成绩优异。但美国一般大学的水平，显然不能满足这个中国青年的要求，他很快就感到“西洋画实在没有中国画高”，并且“日渐觉得我不应当作一个西方的画家”。他沉痛地说：“我跑到这半球来，除了为中国多加一名留学生，我们实在得不着什么好处，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因此，在美国住了不到半年光景，就筹划着提早回国的事了。

按照规定，他可以在美国学习三年到五年，一般同学都是充分利用这些时间攻读较高的学位，回国后也便于取得较好的职位。但是他想的不是这些，他说：“我不喜欢美国，美国的学生没有中国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学生善于思想，勤于思想。他们在我眼里都是年轻的老腐败。……别人以为美国好极了，其实，美国好本好，坏处也不少。”闻一多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美国的实际情况，他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对美国青年的毒害，也认为美国还有它的科学技术等等长处，但是，他还是“不喜欢美国”。应该说，这些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美国

的种族歧视，从他到达美国上岸的那一天起，就给他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受歧视受侮辱的印象。

闻一多在美国的时候，亲眼看到有色人种都遭到歧视，不仅数以千万计的黑人受着非人的待遇，中国人也同样经常受到难堪的侮辱。比如说，租房子就常常受到刁难，在学校里也免不了常遭白眼，在社会活动上象乘车、买东西、上饭馆以至理发等等，稍有疏忽就会碰到不愉快的遭遇。至于在美国一些城市里的“唐人街”的同胞，在美国白人眼中都是“下贱”的人，就是留学生表面上似乎会受尊重一些，实际上正如他在《洗衣歌》前面写的短序所说的：“洗衣是美国华侨最普遍的职业，因此留学生常常被人问道‘你爸爸是洗衣裳的吗？’”在资产阶级白人看来，洗衣这种必要的劳动是卑贱的职业。闻一多为此满怀悲愤写出了著名的《洗衣歌》，其中一节说道：

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

肯下贱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

耶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他想到那些在破旧简陋屋舍中成天同“胰子白水”打交道的华侨，过着凄凉的生活：

年去年来一滴思乡的泪，

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

下贱不下贱你们不要管，

看那里不干净那里不平，

问支那人，问支那人。

他本来是学画的，到美国没有多久，觉得画笔和色彩已不能及时充分表达他爱国的感情了，兴趣转到了文学和诗的

创作上。他成了知名的诗人，他的绘画反倒被人遗忘了。

他一再把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叫作“缓刑”。在一九二二年冬，即到美不过半年光景时的一封家书里他愤慨地写道：“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

在这种心情下，他悲愤地写了长诗《长城下之哀歌》，说“这是我悲恸已逝的东方文化的热泪之结晶”。其实，他也不悲观，又自豪地写出了《我是中国人》，唱道：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五岳一般的庄严正肃，

广漠的太平洋底度量，

春云底柔和，秋风底豪放！

展望未来，他要“洗尽人类底悲哀”，“驱尽宇宙底烦恼”。这又是多么崇高的襟怀！

但是，美国终非“久留之地”，学习上不得满足，精神上感受折磨，他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当其他同学正忙于学位或希求延长留美时间的时候，他却在两年半里读完三个学年的功课，住了不到三年，就决定提前回国了。

向内发展的路

一九二五年五月，闻一多离美回国。七月，经上海等地

返回故乡浹水，往返整整三年。

当轮船驶进了吴淞口，他立刻脱去三年来穿的洋装。从此，一直穿着长袍布履，有时还穿上马褂，冬天则把棉裤脚扎起，穿上一双朝靴。这样的装束，确实很难令人识出是位从外国归来的画家和知名的诗人。

他正赶上伟大的“五卅”反帝运动。藏在他心底的爱国激情，在上海无产阶级和广大市民的怒吼声中更加炽热起来。英雄的群众，英雄的人民，使他感到扬眉吐气，抑不住心中的喜悦，写下诗篇《一句话》，大声地喊出这才是“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憎恨帝国主义，热爱祖国，凭着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善良的愿望，同情人民在国内外敌人压迫下遭受的痛苦，写了一些爱国主义感情深厚的新诗。还在从美国寄回的家信中，遗憾祖国没有象欧美各国那样发生反对暴政的革命！

在一九二五年的暑假后，他受聘担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务长，除了从事艺术教育，还作画写诗。他的家成为北京一批和他具有同样出身和同样爱好的诗人们的“乐窝”。

一九二六年四月，他们在北京《晨报》上创办了诗刊——《诗镌》，在创刊号上，闻一多写了《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一文，针对当时军阀政府屠杀青年的“三一八”惨案，明确表示了对受害者的同情态度和爱国主义思想，认为“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这期间，还创作了一些诗和有独到见解的诗论。他是当年著名的爱国诗人。

那时候，他还年轻，才不过二十七八岁，生活、地位已跻入知识分子的上层，但仍然很想为祖国做一番事业，公开在《静夜》这首诗中宣称：“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贿，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当时，办教育，编杂志，还曾经怀着很大的热望，想用他的所谓国家主义来拯救中国。这是过去我们都曾加以非难的一段经历，应该说“国家主义”自然是不可取的，除了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引起过一些回响，广大人民群众不欢迎它。但他那急切地期求挽救祖国于沉沦、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心情则是感人至深的。这同那一小撮利用国家主义做招牌，混迹于官场的政客文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只是他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的一个尝试，在受到事实的教育后，就无保留地抛弃了这种思想。闻一多严于律己，勇于解剖自己。随着认识的变化，他对一度参予过的国家主义以及“新月派”的活动，再三作过自我批评。

他在那腐朽反动的黑暗社会里，接二连三地碰了钉子。想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情，不仅难得到支持，而且要遭到意料不到的阻碍和打击，什么科学救国，艺术救国等等都是一场空，结果什么事业也干不成（反动统治者是什么也不让干的），反倒被无法逃避的人事纠纷逼得无可奈何地不断改换着工作岗位，最后甚至不得不改行，抛弃早年热爱的艺术了。

他是个爱国热情洋溢的人，义之所在可以奋不顾身不知疲倦地工作，但也还有些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脾气。北伐战争那样激动人心的革命斗争，的确一度把他也捲了进去，在革命军中担任过短期的艺术工作，但很快他就离开了。从此，专心从事教学研究，过着学者、教授生涯。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他先后在上海政治大学、南

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和清华大学教书。开始，讲授外国文学、英诗和戏剧，还继续从事创作，为新诗的发展投入过巨大的劳动。后来，为了反对那种对祖国文化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也为了反对那些敝帚自珍、顽固不化的“国粹主义”者，他决心要逐步弄清祖国文化的真实情况，完全转向中国古典文学，以后又进至金石甲骨文字，连新诗也搁笔不写了。这样，就在他所走过的道路上，来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诗人转变为学者。

他自己把这个转变称为“向内发展的路”，是因为向外的发展道路已走不通，而为了祖国还要有所作为，便把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对古籍的钻研。对现实满怀激愤，却又不得不尽力抑制自己的感情，他写了名诗《死水》，把黑暗的中国比作一潭死水，把反动的统治喻为丑恶，要“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这未免有点过于任性，但他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一沟死水的绝望。这在蒋介石窃夺第一次大革命胜利果实，控制政权，实行疯狂的白色恐怖之时，知识分子更是不断受到威胁利诱，打击迫害接踵而来，面对残酷的现实，有的人洁身自好，有的人沉默不语，有的明哲保身，有的噤若寒蝉，还有的则是看风驶舵，左右逢源，有的干脆卖身投靠成为帮凶，……而闻一多公开对现实讽刺不满，对反动统治者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正是这样，他要远离这样的“现实”，他厌恶这样的“政治”。从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风光优美的青岛海滨，在宁静舒适的清华园里，陶醉于古书的纸香之中。这位知名的诗人，又逐步在古典文学和古文字学等方面博得人们的称誉，成为知名的学者。

郭沫若同志对闻先生的这段生活，特别指出：“他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这就是他的治学的根

本态度。为着要得虎子而身入虎穴，决不是身入虎穴去为虎作伥。”“这就是说钻进‘中文’——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里面去革中文的命。”“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郭老真是闻一多先生的知己，对这条“向内发展的路”的真实意义，可以说是作了深刻而又具体的阐明了。

闻一多是位严肃的学者，一丝不苟，把钻研古籍作为“向内发展的路”，是有所为而去清理故纸堆的。他按着传统的治学方法、习惯进行研究，循着考据训诂的道路，追溯溯本到甲骨金石文字，从缜密的考证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澄清过一些前人未能澄清的疑难，但是也常遇到不少用传统观念难以排解的问题。当他看到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著译作品时，思路开朗多了。一九三〇年，郭沫若同志在被迫流寓日本期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划时期的名著，作者利用对金石甲骨文字的研究成果和大量的其他考古资料，来认识和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论证中国也同样经历过奴隶社会，驳斥了一些反动学者的谬论。

这部书对闻一多震动很大。他看到早年的诗友，不期然地又在古文字的研究领域里重逢，虽然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解不尽相同，但学术上的造诣则令他十分折服。当有的人故意刁难挑剔郭老的著作时，他毫不含糊地维护郭老的功绩。他认为郭老说的十句话，那怕只有三句四句是对的，也是了不起的，因为他说了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提出了新的见解；有的人尽管一句话也没说错，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都不过是重复前人的话（何况前人的话，也未必不错）。这样，学术研究还怎么能有进展？

他从当年史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从新史学家